

“复数”的社群

——现代性中的政治哲学重思

李牧今

【内容摘要】 重审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持续多年的规范性争论可以发现，在数字化与全球流动塑造的“复数”社群现实中，无论是自由主义依赖的制度中立，还是社群主义强调的文化承认，均暴露出整合乏力的局限。新的制度构想亟待探索。借助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可以提出“反思性—多重归属”的身份逻辑，从而揭示当代个体如何在多元社群之间展开认同实践。应对复数社群的现实已非纯粹的伦理选择问题，而成为现代社会制度设计中无法回避的治理难题。基于此，本文批判性地检视现有范式的局限，尝试在理论语言与现实困境之间搭建桥梁，主张政治哲学应从价值高下的规范争议，转向制度建构的可行性路径，探索一种可容纳差异、激发团结的“整合性共同体”框架。

【关键词】 现代性 自由主义 社群主义 反思性身份

【作者】 李牧今，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身份认同处于多重归属关系的张力之中，个体被横向与纵向两种力量同时拉扯。横向上看，家庭、地方共同体、职业组织、虚拟网络、国家乃至跨国文化体系交织成复杂的归属网络，各社群的价值主张相互牵扯，个体在其中频繁切换，稳定的“自我”难以确立。纵向上看，现代性所引发的传统断裂削弱了个人与历史、记忆之间的联结，使那些曾支撑个体认同的价值体系日渐失效，代际撕裂、地方—国家认同错位、线上线下一关系割裂等现象日益构成我们生活的现实图景。面对这一“复数”社群的现实结构，重新审视“个人与共同体之关系”这一政治哲学核心问题变得尤为必要。

围绕“个体如何在多元社群归属中理解自己”“社群对个体还有怎样的意义”“个体是否仍然能够超越所处的社群背景，自主确立价值判断与生活方式”等问题，在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仅凭政治哲学内部的理论资源已难以充分回应。我们亟需引入其他学科的分析路径，利用其



对现代社会结构与个体处境的敏锐观察，弥补政治哲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解释力不足。笔者尝试在政治哲学的框架内吸纳社会学对现代性的分析成果，展开对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再评价，并探索在复数社群的现实中个体认同与共同体认同之间协调的可能，为构建适应现代社会复杂结构的政治理论提供新的思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区分“社群”与“共同体”两层用语：前者指现实结构中的具体归属网络，后者则用于分析政治哲学中涉及身份、规范与价值整合的理论概念。两者虽均对应英语中的“community”，但在语义功能上有所区分。

在现代性中被重塑的“共同体”

在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争论中，“共同体”始终是绕不开的核心概念，两个流派对“共同体如何构成”“共同体何以可能”隐含着不同理解。在现代性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结构正在经历深刻的重塑，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一概念的现实基础与理论内涵。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性的分析为此提供了重要理论视角。在他看来，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异，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制度的变迁上，更在于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发生了深刻改变。“时空间离”“脱嵌”“反思性”等概念共同勾勒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逻辑，也改变了我们理解个体与共同体关系的基本方式。我们将以“共同体的结构性变化”为出发点，借助吉登斯的理论资源，对现代社会中共同体的生成机制进行重思。这一变化不仅影响个体认同的建构路径，也构成理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现实语境。

现代性最根本的动力机制之一，是时间与空间关系的重构，吉登斯称之为“时空分离”（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这一概念揭示出：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处在”（situated）一种不同于前现代社会的时空结构中。在传统社会中，“何时”通常与“何地”紧密相连，“在场”（presence）的互动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而在现代社会中，全球统一时间与远距通讯使跨越广袤空间的协作成为常态。^①此时，“场所”不仅由具体的在场事物构成，还可以被远距离的信息流或结构性力量所穿透与塑造，决定一个场所性质的，往往是那些不可见的、间离的社会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在场”由此呈现出一种“非在地性”。质言之，在现代性条件下，个体不只是在“本地”行动，也不只是嵌入“当下”的组织关系，时空的间离性成为社会结构的新常态。这一秩序转变对共同体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共同体往往建立在地域、时间与情境三者叠加的基础之上，其存在依赖于人们的共处与共时。而现代社群关系则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可以跨越时空，广泛分布。“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因而跳脱了“地方性共在”的前现代范式。这种深层变化不仅为下面讨论的“脱嵌”机制奠定了基础，也构成我们理解现代共同体变迁的关键线索。

如果说“时空间离”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个体与场所的物理脱离，那么“脱嵌”（disembedding）机制则揭示了社会关系在物理层面松动之后可能的重组方式。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所特有的脱嵌机制构成了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关键特征之一。脱嵌依赖两大机制：象征标识（symbolic tokens）与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s），它们共同构成了吉登斯所称的“抽象体系”（abstract systems）。象征符号自古有之。在前现代文明中，特定的地域与传统自然地引申出被特定群体所共享的符号体系。^②这些符号的含义只对“我们自己人”有效，并且也只在共同的经验背景下被“我们自己人”所理解。但在现代社会，被更多使用的是可以不考虑特定场景，也无需依赖个人或团

①② 参见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5—17页，第17—18页。

体特殊品质的通用象征符号。例如，编程语言具有跨文化的通用性和全球适用性。它是信息时代的基础工具，使个体能够嵌入远距离的社会关系网络。

进一步看，对特定地域和传统的依赖，使得前现代文明有着被特定群体所认可和推崇的“专家系统”。他们可能是受人仰慕的宗教神职人员、德高望重的名门士绅，或是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大师，其地位更多基于实践经验、社会声誉和传承的知识体系。而在现代社会，专家系统以标准化的学术资质、制度化的培训体系、可验证的专业知识为基础来建立信任。人们把信任投向抽象体系本身，这个系统提供了某种比前现代经验更为笃定的感受，它能跨越间离的时空来“保障”人们的期望不会落空。个体将社会合作维系在对制度和专业的依赖上，而非熟人网络，这使得社会关系能够在缺乏亲密基础的情况下被延展并维持运行。

这两种机制的运作，深刻改变了共同体的构成逻辑：它们使共同体的建构不再依赖面对面互动或地域共享，而是转向一种制度化、结构化的联结模式。共同体从“经验性在场”转向“结构性信任”，从“共同经验背景”转向“抽象规则系统”。脱嵌机制因此不仅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解嵌与再组，更标志着共同体的生成逻辑从“熟人网络的亲密共识”向“制度化体系的联结协作”的根本转变。

在上述刻画中我们看到，“个人”“社会关系”“共同体”一旦被置于现代社会的结构背景中，内涵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个体与他人的互动方式，更动摇了我们对于“共同体何以可能”的基本理解。从这个意义上看，吉登斯所揭示的“脱嵌机制”不仅是社会运行方式的更新，更意味着共同体生成逻辑的根本转向：它不再天然地扎根于血缘、地域或传统经验之中，而是在抽象体系与结构性信任中被重新建构。这一结构性变革对传统社群主义中关于“社群”的一系列前提设定提出了挑战，也构成了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建构的深层背景，接下来的讨论将在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在“脱嵌”与“再嵌入”的双重过程中，社群的结构、功能与正当性是否也需要被重新界定？传统社群主义理论在当下语境中是否存在解释力局限。

从嵌入到反思：现代身份认同的生成逻辑

现代性所揭示的社会结构转型深刻重塑了共同体的生成逻辑。在此背景下，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也译作“共同体主义”)重新提出“共同体优先于个体”的命题，试图回应现代社会中个体身份的失根状态，并为社会整合提供伦理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潮流之一。尽管其内部立场多元，理论资源各异，但这些思潮均指向对自由主义以“自我”或“个体”为基本分析单位的系统性反思。社群主义并不否认个体的重要性，但在其看来，构成并最终决定个体身份的是其所处的社群。正是社群中的价值、语言、传统、信仰等塑造了个体的规范性认知与道德能力。因此，社群主义主张将“社群”而非“个体”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变量。它强调，社群的形成源自一种前政治的共同性，包括一段被共享的历史、一种被继承的传统，以及对“好生活”的共同理解。社群被视为一种先于政治存在的情境性的文化整合结果，其叙事界定了人们对正义与善的认知基础。然而，面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变化，社群主义所依赖的“共同体图式”是否仍具解释力？社群主义对“归属”“认同”与“善”的理解是否需要更新？接下来的讨论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社群主义强调，个体认同总是在特定情境中被构建与传承。因此，它对共同体的理解依托于两个重要维度：一是具体可感的社会空间；二是在该空间中形成的传统记忆。首先来看其对“具体社会空间”的重视。社群主义普遍认为，地域性在共同体的形成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是历史记忆的积淀，还是生活方式的塑造，空间的“在场”都构成了个体归属经验的基础。家庭、村落、宗族、邻里等关系网络，皆以物理空间的嵌入性为前提。然而，如前文所述，现代性带来的“脱嵌机制”正持续削弱地域性与归属感之间的稳定联结。一个活跃于虚拟空间、以远程社交为主要交往形式的个体，未必对其日常所处的地理空间产生深度的情感依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已完全“脱嵌”于物理社区。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日复一日生活在同一社区，地域性的亲切感仍构成他们重要的生活背景。但正如吉登斯指出的，即便这种嵌入性延续着表层的熟悉感，被动的“再嵌入”早已发生在这些看似稳定的社区。例如，你经常光顾的家门口小店，其实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全球商品体系与网络重构，将“本地空间”转化为“远程力量的表现场域”。“地域性社区不再仅仅是一个浸透着为人熟悉的毋庸置疑的意义的意义的环境，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远距离关系（distanciated relations）的地域性情境的表达。”^①事实上，在全球化与虚拟交往高度渗透的时代，地方性与全球性、在场与间离、熟悉与抽象之间构成了一种动态交织的图景。

社群主义得以成立的另一个关键前提是对“传统”的重视，其要义不是对前现代社会的理想化怀旧，也并非一种复古倾向，而是重新强调传统在身份建构中的意义。在其看来，传统既为个体行动提供意义框架，也是社会整合与规范秩序的基础。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展开，人们的观念与实践日益以反思性方式组织，传统所具有的确定性和权威性不断受到侵蚀。这一过程在吉登斯那里得到了系统刻画。在其框架中，“反思性”（reflexivity）与“时空间离”“脱嵌”等概念并列，共同刻画着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意指社会行动者不断将新知识反馈于实践过程，从而动摇既有权威、改变既定规范。在现代社会“反思性”的作用下，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被放置于“当下”这一标尺之下，“以前如此”若不能与“应当如此”相一致，就会被怀疑、修正乃至摒弃。^②这一变迁推动传统从一种封闭的集体共识转化为开放的文化资源，进入一个多元化、碎片化与主观化的时代。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带来不同传统的共存，个体不仅可以在不同传统之间自由选择，甚至可以将多种传统杂糅使用。在此情境中，传统已不再是个体“必然”隶属的文化环境，而是一种可供选取、组合乃至消费的文化资源。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变迁具有惯性，许多习俗仍以各种方式留存并影响人们的生活。但必须指出的是，如今由专家系统、抽象指标和标准化评估体系所主导的知识结构，正逐步取代传统所提供的价值依据。在面对重大抉择时，人们更倾向于依赖于“数据”与“模型”支撑的判断，而非源自文化传统或社群经验的直觉指引。例如，在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个体被设定为在脱离文化背景的前提下进行理性选择的人，社群、历史与情感往往不是主要考量因素。更进一步，即便是那些看似与个体主观体验密切相关的“幸福”或“美好”等问题，如今也有了标准化的测量体系：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美好生活指数”（Better Life Index）广泛传播，以高度抽象和技术化的方式将复杂的情感与生活意义“指标化”“排序化”，使其脱离具体的文化和社群背景。

可以看出，尽管社群主义在强调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深度关联方面具有重要洞见，但它对“社群”与“身份”的理解，往往建立在某种较为本质主义的设定之上。它倾向于将个体视为某种文

①②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第95页，第33页。

化传统与历史共同体的“发现者”与“继承者”，而非在多重归属中进行身份建构的“选择者”或“行动者”。个体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与善观念被视作“厚重语境”的习得性延续，自我不过是共同体价值的延伸。这一理论逻辑在查尔斯·泰勒、麦金泰尔与桑德尔等人那里均有体现。泰勒强调，“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而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①麦金泰尔指出，个体的人格是“彻彻底底”的伦理主体，无法与一种特定的精神（Ethos）及其实质性价值视域相分离。如果自我以极端方式与其共同体保持距离，它便失去了对现实的判断标准。^②桑德尔则说：“关系并非他们选择的结果，而是被他们发现的纽带。”^③然而，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这种强调归属先在性的身份理解，也面临着落入“单一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④的风险。社群主义对“归属”的强调在面对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结构与多元社群现实时，其解释力日益捉襟见肘。

面对这一理论局限，有必要引入新的分析框架，以重思现代个体身份的生成机制。吉登斯提供了一种具有修正性的理论视角，现代社会的“时空间离”“脱嵌机制”与“反思性”深刻影响着个体身份的生成。身份不再是“被发现”的固定存在，而是一项必须“被实践”的反思性项目。个体在不断更新的知识体系与社会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价值与生活路径持续进行解释与调整。认同的本质，不是对过去的忠诚，而是在当下情境中不断展开的自我理解行为。这种“反思性的自我建构”并非否定个体的社会嵌入性，而是在承认其经验“起点”的基础上，突出个体在身份选择与归属中的能动性。现代人并非生活在一套稳定结构中，而是在开放性结构中，在制度变迁与文化差异交错的环境中，通过反思与实践“成为某种身份”。身份由此不再是单一社群的产物，而是在多重社群间的张力与转换中生成的结果。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并不直接预设社群的消解，也无法推导出个体将脱离社群生活的结论，但它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建立在“空间在场”与“传统延续”基础上的社群形态受到冲击时，在高度流动与持续重构的现代社会中，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社群”。当代社会中的社群形态呈现出高度差异化的特征：家庭、宗教团体、职业网络、线上社区乃至国家与民族，虽皆可被称为“社群”，但在规范结构、情感密度与联结方式上显著不同，有些源于自然生成，有些则是个体基于偏好或利益而主动参与、持续建构的结果。这一现实表明，我们既无法继续以单一范式解释社群的多样形态，也难以通过单一维度把握个体与社群之间日益弹性化、复合化的互动关系。进一步看，不同类型社群所承载的规范期待本身也并不处于同一层级，其相关诉求分别指向伦理认同、法律地位与政治参与条件等不同维度，由此产生的冲突，也未必发生在同一规范层面之上。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将对归属与认同的理解，嵌入一个更为开放、多层次且动态的复数社群图景之中。这一理论前提，构成理解当代社会整合机制的关键起点，也为后续关于多层次、情景化的承认与制度整合路径的讨论奠定了必要基础。

从复数社群走向整合性共同体

从前文对现代社群形态与承认逻辑变迁的分析可见，当不同规范层级上的承认诉求同时进入公共场域，如何为其构建一种可被共同接受的政治组织方式成为棘手难题。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进一步具象为，个体如何在不同场域中确立自身参与的正当性，或者说“我如何提出可被公共接受的理由”。由此可见，社会学对现代性的事实描述，已然转化为政治哲学必须应对的规范压力，

① 参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0页。

② 参见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Third Edition, South Be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p. 204-225.

③ 参见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19页。

④ 阿玛蒂亚·森：《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李风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同时也构成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分歧的理论背景。

若从制度构想的维度考察，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正是对现代社会中价值分化与社会整合之间张力的重要回应。罗尔斯曾指出，对于“理性多元”（reasonable pluralism）事实的深刻认识是其政治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思考前提。^①这一概念虽不直接以“现代性”为研究对象，却为理解复数社群提供了政治哲学层面的规范表述。罗尔斯追问，当理性多元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政治制度应当如何提供正当性来源？他主张将政治正义原则与宗教、道德和哲学等价值观念“划界”，在制度层面维持中立性。如此一来，不同文化背景和伦理信仰的公民可以在各自的“统合性学说”（comprehensive doctrine）基础上，达成一种“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②在此，政治身份是合作的前提，私人身份是理解多样性的来源。

支持这种身份划界逻辑的，是罗尔斯对现代个体具备“反思能力”的强调。他认为，自由个体之所以认同某种善观念，不是因为它“被给予”，而是因为经过反思后人们认为其值得认同。这一前提使个体不再被视为单一社群的被动承载者，而是拥有选择、修正与调整其价值取向与认同方式的主体。^③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政治自由主义的制度设想仍然存在局限。其一，它寄望于个人用“政治身份”在中立程序下进行理性协商，这种假设在实践中往往面临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风险。其二，它在处理激烈的文化冲突或非理性的集体情绪时，可能显得过于依赖程序理性，缺乏有效的情感调节与回应机制。而在当前，这一设想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数字媒介与算法推荐机制深度介入公共讨论，使人际交往更加脱离共享时空与共同经验。一方面，高度个性化的信息分发强化了群体间的认知边界，削弱了不同立场之间形成共同问题意识与可沟通话语的基础；另一方面，“数字化部落主义”的持续蔓延，不断压缩理性对话所依赖的开放空间，阻碍异质观点的有效交流与碰撞。这些趋势表明，政治自由主义若要在数字时代维持其整合效能，就必须发展出更具创造性与适应性的制度想象。

如前所述，相较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主张政治理论应更加“敏于情境”，尊重不同群体在历史与文化上的独特性。然而，当不同社群的价值体系、规范结构与集体记忆之间出现张力时，缺乏制度安排的“文化承认”反而容易转化为“单边强化”。一方面，它可能放大某一群体的政治诉求，使文化差异沦为排斥他者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容易诱发身份认同的碎片化与冲突化趋势，难以在多元社会中维持合作秩序。换言之，在缺乏有效制度中介的情形下，即便是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叙事，亦可能在具体政治情境中被转化为排他性的正当性资源。因此，在一个归属结构高度多元化、身份流动性增强的社会中，社群主义的“情境主义”必须走出对“单一场域”的预设，转向正视结构性复数。

自由主义强调制度中立，社群主义强调文化承认，两者各有侧重地为多元社会整合提供了方案，却都难以全方位回应的复数社群的现实冲突。要让复数社群从潜在冲突源转化为公共合作资源，亟需一种结合二者优势的新视角，在此背景下，“反思性—多重归属”的身份逻辑，为我们打开了一条新的理论路径。它揭示：现代个体的认同既深嵌于文化与历史痕迹中，又在不断变动的制度与价值资源之间展开重塑。现代个体身份的构成性与反思性并存，呈现出一种嵌入多重关系网络中并不断生成的情形。这一逻辑不仅重构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也对政治制度提出了新的整合要求。微观层面，现代个体的生活在“社会学化”“心理学化”“经济学化”的反思回路中不断重组，在其中，尊重与怀疑、归属与不安、差异与秩序相互交织；宏观层面，当代社会的精神结构渐趋碎片化状态，诸如“整体社会”“伦理秩序”“实体传统”等曾被视为稳固的范畴，在

①② 参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4页，第30、146页。

③ 参见 Will Kymlicka, “Liberal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18, no.2, 1988, p. 190.



① 莱纳·福斯特(1964—),德国政治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代表人物之一,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实践哲学和批判理论。

② 参见莱纳·福斯特:《正义的语境: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张义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

③ Iris Marion Young, "Polity and Group Difference: A Critique of the Ideal of Universal Citizenship," *Ethics*, vol. 99, no. 2, 1989, pp. 250-274.

④ 参见 Gerard Delanty, "Citizenship as a Learning Process: Disciplinary Citizenship versus Cultural Citizen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felong Education*, vol. 22, no. 6, 2003, pp. 597-605.

现代性的持续冲刷下逐渐松动。现代社会中“整合性共同体”的逐步弱化——表现为认同的碎片化、公共性的稀释、归属感的流动不定——构成我们必须面对的深层风险,重建个人与一种整合性共同体之间的联结势在必行。

针对复数社群条件下差异如何被制度性整合的问题,莱纳·福斯特^①(Rainer Forst)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回应。他指出:“无论是按照区分私人一种族身份和政治身份的自由主义模式,还是按照在伦理上统一身份的社群主义模式,都无法把握一个‘多文化的’社会。”要回应这个问题,“必须有一种差异化的公民资格概念,它将伦理差异、法律平等以及政治的和社会的包容彼此联系起来。”尽管福斯特更加专注于规范性的理论支持,但他构建的“伦理—法律—政治—道德”四重承认路径,为差异社会提供了一幅分层协调、制度整合的理论图谱。福斯特提出“语境敏感性”,认为普遍原则必须在各自语境中予以恰当讨论与回应,而非混为一谈。他精当地指出,公民应在伦理上珍视(Schätzen)与被珍视(Geschätztsein),并拥有(在各种强度上的)自我价值感;在法律上尊重(Respekt)与自我尊重;在政治上具有责任感(Verantwortlichkeit);在道德上得到尊重(Achtung)并拥有自尊。^②这一精固框架既避免了“实体性共同体”的同质化倾向,又克服了“空洞性整合”的程序贫乏,与本文“反思性—多重归属”视角互为支撑,为我们转向治理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理论坐标。作为当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福斯特的主张既体现了制度理性的细致建构,也承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不平等关系与排斥机制的批判视角。

可以看到,所谓“复数社群”并非指简单的多元文化并置,亦不等同于身份政治语境中差异表达在数量上的增加,而是指在现代社会分化条件下,多重规范来源与多重归属关系在同一政治空间中的交织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复数社群所引发的挑战,已不再主要体现为价值立场之间的规范性分歧,而是日益呈现为制度层面的整合性难题。问题的关键,并非简单地对不同善观念作出优先性裁决,而在于如何在不可通约的多元差异条件下,构建一种能够持续运作的共处结构,使差异能够得到表达与调节。复数社群之间的张力,在缺乏制度化中介机制的条件下,往往更容易表现为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当具体生活经验能够转化为一般化政治语言的制度安排时,差异性便有可能获得有限整合。因此,“复数”并不单纯意味着规范的碎片化,而是对制度层面的转化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政治哲学关于正义、善与共存问题的既有讨论,当下更为迫切的,是对规范主张如何通过制度安排获得现实承载,并在复杂社会条件中发挥整合作用的重新思考。在这一方向上,已催生出很多重要的理论拓展。例如,在协商民主层面,这意味着构建一种对差异保持敏感的公共领域形态,即不将公共理性狭义地理解为纯粹理性论证,而是承认叙事性表达、情感诉求乃至艺术性呈现,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同样具有协商价值。^③于社会整合而言,则需通过公民教育与制度创新,系统培育公民的协商能力与多元文化素养。^④公共参与不应仅限于正式的议会与听证机制,还应通过社区议事平台、线上公民论坛等“微观公共领域”,为不同社群成员提供在其熟悉与信赖环境中发声的制度通道。同时,通过跨社群协作的公共项目,将共同实践转化为促成政治团结的现实基础。这些多维度的制度探索,共同指向一种“整合性共同体”设想,它不应是社群主义式的“厚共同体”,也不能是自由主义式的“程序壳”,而应成为能够组织差异、维系共处、激发团结的结构框架。可以看到,在实践层面,复数社群的整合问题并不局限于宏观制度设计,还涉及教育体系、社区治理、媒体传播与数字平台规则等多重层面的协同安排,取决于具体制度是否具备吸纳差异、调节冲突与促成信任的能力。唯有将规范性理想落实到可操作的制度机制中,现代社会中关于“正义”“稳定”与“团结”的承诺,才有可能穿透抽象愿景,

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制度结构。对这些问题的回应，将决定复数社群能否从潜在冲突源转化为合作动力。

质言之，在现代性复数社群的现实语境下，政治哲学需要在差异与整合之间建立制度化连接，弥合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裂痕。唯有如此，相互交错的社群关系才有可能转化为公共合作的生成资源，现代共同体才能在不抑制多样性的前提下恢复凝聚力和正当性。为此，本文提出三项制度性核心问题：从承认维度看，政治制度应如何承认多重归属的现实结构？从正当性角度看，如何在缺乏统一伦理的社会中建构正当性？从稳定性需求看，如何为流动与杂糅的身份提供稳定而非强制的支持？这些问题表明，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已难以依赖理念一致性的预设，而愈发立足于结构上的可容纳性，这是回应社会正义与团结需求的一种实践形态。这不仅关乎政治技术的优化，更关乎在差异与不平等交织中，开辟真实的社会整合前景，并在此过程中切实地保障个体自由与权利。

进一步而言，在数字化交往深刻重塑公共生活形态的当下，“复数社群”问题正步入一种新的情境。平台化中介通过算法排序与兴趣聚合，将原本分散的文化差异与价值取向重新组织为高密度的信息共同体，使个体得以在相似经验与情感共鸣的共振中快速形成群体归属。然而，这种以数据与偏好为纽带的社群生成机制，也可能在无形中削弱不同社群之间共享问题意识与公共语言的形成条件，使规范分歧在跨群体互动中呈现为彼此竞争的正当性宣称，而非可对话的差异。因此，在高度媒介化的社会条件下，如何通过制度安排重建异质社群之间的有效沟通渠道，使差异能够在规范框架内获得表达，并在冲突中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整合，已成为数字时代政治秩序建构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不仅构成政治哲学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所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也是检验其理论能否真正回应复数社群现实挑战的关键尺度。

结语

在现代性的复数社群现实中，身份已不再由单一归属决定，而是在多重关系网络中持续生成。自由主义通过制度中立守护权利，社群主义以文化承认维护差异；但在面对身份的流动性、多样性与重构性时，均显现出理论局限与实践困境。本文并未试图为自由主义或社群主义裁定高下，而是试图将这场旷日持久的规范争议引向其生成的现实土壤。本文主张以“反思性—多重归属”为基础理解现代身份逻辑，这一视角不仅有助于突破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也指明了现代社会中的“整合性共同体”并非回到封闭实体，而是一种能够接纳差异、促进协商、维系团结的制度结构。笔者认为，理论的价值不在于赢得逻辑一致性的竞赛，而在于回应具体而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真正迫切的任务，不是提出一个新的“主义”，而是重设问题的焦点：从“谁的理论更正确”，转向“在什么样的制度结构中，我们可以实现合作共存”。在这一转向中，社会学的现代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关键的启发，使我们得以超越价值哲学的困境，重新思考制度设计的前提与边界。这既不是理论的退却，也不是现实的妥协，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哲学立场：以制度为中介，在“复数”之中寻找秩序，在差异之中生成共在。这不仅关乎理论，也关乎我们共同生活的未来。

编辑 张 蕾